



梁士强林學術著作選集

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刘建 编



本书出版得到了季羨林基金会的部分资助

季羨林學術著作選集



中国文化与 东方文化

刘建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 刘建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1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

ISBN 978-7-5104-4842-3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中国—文集②
东方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②K1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1471号

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编 者: 刘 建

责任编辑: 张世林 乔天碧

审 读: 杨汝模

封面设计: 贺玉婷

版式设计: 张世林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04-4842-3

定 价: 60.00 元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树英

副 主 编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树英 刘 建 李 南

张光璘 葛维均 薛克翘

特邀编委 张世林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 编选说明

季羨林先生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学者，长期以来，季先生的作品畅销于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这些作品大多为季先生各时期创作的散文。季先生一生创作出版散文集二十余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其中有许多精品脍炙人口，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散文家。但是，季先生毕竟主要是一位学者，他终生笔耕不辍，孜孜以求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对社会的主要贡献也是他的学术成就，散文只是他的一种“余兴”。

季羨林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毕生从事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涉及语言、文学、美学、艺术、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其学术著作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糖史、吐火罗文研究等。这些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季先生的学术著作，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独辟蹊径，发人深省，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编辑了这套选集。本选集从季羨林先生的学术著作中，精选出论著二百余篇，辑为十二卷，依次为《印度古代语言及吐火罗文研究》（葛维钧编）、《印度历史与文化》（王树英编）、《印度作家作品评论集》（刘建编）、《佛教》（李南编）、《糖史》（葛维钧编）、《中印文化交流》（王树英编）、《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刘建编）、《东西文化比较》（张光璘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薛克翘编）、《学海泛槎——学术回忆录》（薛克翘编）、《回忆中国学人及文化问题新思考》（张光璘编）、《序跋集》（王树英编）。选集所选内容基本涵盖了季先生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所选论文皆为季先生在各学术领域中的代表作。

我们怀着敬仰和缅怀的心情编选这套选集，尽管我们殚精竭虑、费尽心力地收集、编选季羨林先生的文章，但仍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殷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编辑委员会

2013年1月

目 录

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	1
学术研究的一块新园地	10
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	14
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	20
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	29
《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36
读马元材著《秦史纲要》	40
《列子》与佛典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	44
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	
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58
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	92
中国同孟加拉国的友谊源远流长	102
答《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记者问	111
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	115

关于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	
初步意见	123
东方文学	133
敦煌舞发展前途无量	136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139
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64
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	173
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	183
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187
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201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215
《生殖崇拜文化论》序	228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240
读日本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有感	259
论《儿郎伟》	262
从中国文化特点谈王国维之死	268
《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序	272
“高于自然”和“咏物言志”	
——东西方思想家对某些名画评论的分歧	301

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

说到东方语文学，我们顾名思义，就会想到东方。这里所谓东方，是从欧洲人眼中看的，差不多是指整个的亚洲。但范围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譬如俄国，虽然有一多半在亚洲，通常是不算做东方的。

大概说起来，东方语文学的范围比通常所认为的东方大，因为连非洲的语文也包括在它的研究范围内。古代的埃及文，近代的亚比西尼亚和其他黑人的语文，都是欧洲东方语文学者研究的对象。但在另一方面，有的真正的东方语言，譬如说印度的梵文，在有些大学的课程里，被排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比较语言学里，同希腊文，拉丁文，古斯拉夫文，北欧古文在一起。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梵文确是印欧语系古代重要语言之一，是现在欧洲语言的老祖宗。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看出来。所谓东方，所谓东方语文学，范围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精确地划定。

比较地说，东方语文学算是很年青的学问。因为这里面包括的语言很多，每种语言研究的历史又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把研究的历史详细叙述。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东方语文的研究大半在十九世纪才开始，然而就在这一个世纪里面，在这方面努力的学者已经获得惊人的成绩，使人一看起来，觉得这种研究一定已经有了很悠长的历史，哪里会想到还不到一百年呢？就拿梵文的研究来说吧：在十九世纪初年有几个在印度服务的英

国人开始注意到梵文。他们本身并不是语文学者，不过希腊文同拉丁文他们在中学里都读过，忽然发现梵文同希腊文拉丁文有些地方很相像，于是发生了兴趣，就开始研究起来，因而就奠定了印度语文学研究的基础。后来法国学者也接踵而起，对梵文研究也有相当的贡献。在这时候，逢巧有几个年青的德国学者在法国留学，把梵文的研究带回德国去。从此以后，德国就成了梵文研究的中心。有的梵文学者把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于是就产生了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史和比较宗教学。同时对各种印度古代的宝藏都研究到了：四吠陀，文法学，世界最长的史诗，这些印度人认为最神秘最深奥的东西都大白于世了。德国的梵文学者在这方面始终居领导的地位，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末年。

到了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东方语文学的研究意外地得到一种推动力。最先英国学者 Stein 到中国的新疆去考察，在和阗附近发掘，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东西，他写了几部很大的著作，把他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公布出来。接着是德国的学者 Le Coq 同 Grunwedel 前后几次组织考察团到新疆去，他们在 Idikutsari 发掘出很多极珍贵的东西，同时又在古庙的废墟里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壁画。在这些东西里面最有学术价值的就是许多古代手写的稿本，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绢上。在这方面，俄国学者也曾参加工作，组织考察团到新疆去。Petrovski, Kumentz 同 Oldenburg 都有很重要的发现。至于法国，我们都知道伯希和曾经到敦煌去考察，把敦煌石室里的珍奇的古籍搬到法国去。这里面有中国久已失传的古书，和唐代人的手迹，比我们平常认为最珍贵的宋板价值还要高得多。伯希和捡剩下的古书还有很多，中国当时的北京政府

听说了，派人去运走一部分。日本人也派人到新疆去做过发掘工作，也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这些学者所发掘搜集的材料，种类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手写的稿本。论内容，这些稿本大半都是佛经的译本；有的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有的间接从别的文字转译的。论文字却出人意料地复杂。只就字母说，就有波罗密字、驴唇字、西藏字、粟特字和几种到现在还没有读通的字母。有的文字简直用中文作了注音符号。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欧洲学者们拿到这许多材料，虽然隐约地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无量的宝藏，但却像拿到天书一样，他们读不通，不知道这究竟是些什么文字。他们面对着这难关，一点也不屈服，立刻分头去研究。字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里面有几种字母是他们熟悉的。譬如说波罗密字和驴唇字，他们在研究印度碑刻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但虽然认识了字母，字母组成的字他们仍然不认识。只认识字母而不能认识字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我们都能想象到，这是一件怎样困难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有学习外国文字的经验。就拿学习英文说吧！英文在近代文字中算是最容易学的文字。我们有良好的教师，编好的字典和课本，另外还有许多课外读物。每礼拜四小时的正式上课，再加上不知多少小时的自修。就这样，学上几年，天分低的还不能离开字典自由看原文的书。倘若现在有人拿一种奇怪的我们不认识的文字给我们，这种文字的文法比英文复杂到不知多少倍，没有教师，没有字典和课本，当然更没有写好的文法，他就让我们

读通这文字，请问我们怎么办呢？

在欧洲学者面前的，就是这种看来似乎毫无解决希望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仍然是干下去。这里的文字多，读通的过程和所费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一一详叙。现在我们就拿吐火罗文的研究来作例子，说明读通一种新文字的过程。吐火罗文的稿本大半都是用波罗密字母写的，除了几个新的字母以外，读起来并不难；所以字母这一难关不久就克服了。但是吐火罗文有一个特点，它并不像现在的英文、德文每个字都是分开来写的，所有的字母都写成一串，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分开来。这一点更增加了研究的困难。最初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只对着一大篇字母，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渐渐地他们发现了其中有的字很像梵文，于是就把这些字抄出来。抄的多了，在里面也就可以发现声音转变的律则。偶尔又发现了几个断片，这几个断片有别的文字的译本，于是就根据这译本把这几个断片读通，把语法构造仔细研究了一遍，立出几个假设来。再继续研究下去，或者推翻这假设，或者助成这假设，终于渐渐建立起几个很简单然而却又很基本的原则来。这些工作都有特别的困难处，一方面要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却又要特别机警。再说神秘一点，有的时候简直全靠运气，有些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吐火罗文终于研究通了。有一个学者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只要稍稍能领略其中的困难，就会觉得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或者有人要问，读通这些文字究竟对人类文化有什么意义呢？要想回答这问题，我们要对东西学术史作一个鸟瞰。我们都知道，

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学术的研究并不是平均发展的：有的时代学术研究的成绩很辉煌灿烂，有的时代却又很不振作，毫无生气。领导一个辉煌灿烂时期的，大半都是新材料的发现。尤其在精神科学的研究上，旧的材料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各方面都研究到了，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倘若在这时候有新材料出现，学者们得到新的鼓舞的力量，不久就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开创一个新时代。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只在中国学术史里就可以找到许多。过去的我们不必说了，只看近几十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就可以明了新材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以前，我们中国的古史实在还没有脱离神话色彩。当然，在中国，正如在西洋，是颇有些人们相信神话的。不过这些人同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始终采取敌视的态度，虽然他们在内心里也未必不承认在这方面的成绩。无论怎样，我们现在真可以说，我们对商代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个真确而清晰的概念了。这种研究现在还在开端，将来的成就虽然还不能预卜，只就眼前的成绩说，已经可以说是超迈前古了。而且，历史的研究不过只代表一方面，其他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也都跟了甲骨文的发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都表现了惊人的成绩。以前不能了解的句子现在了解了，以前不能读的书现在能读了，我们真不能想象，再过一百年在这方面的研究会灿烂辉煌到什么地步！

但是，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影响是只限于中国的。新疆这几种古代语言的发现，却有世界的意义。这话似乎太空洞。我们仍然拿吐火罗文作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都知道，印度欧罗巴语

系普通分为两支：一个东支，比较语言学里的术语叫做 *Satem*；一个西支，在比较语言学里叫做 *Centum*。希腊文，拉丁文同近代的欧洲语言都属于西支；梵文，古代波斯文等属于东支。就地理说起来，这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自从吐火罗文发现以后，这种很自然的局面有点混乱了。第一，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在中国的新疆会发现印欧语系的语言，因为现在那里流行的语言是东土耳其语。第二，即便发现了印欧语系的语言，按地理说，也应该属于东支。然而吐火罗语竟属于西支的 *Centum*。这样一来，他们研究的基础有点动摇了，同时他们也有了新的研究的出发点。现在还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在一群 *Satem* 语言里忽然出来一个 *Centum* 语言。这问题牵连到印度欧罗巴人种，也就是现在所谓雅利安人或白人的迁徙问题；再进一步，就关连到雅利安人原在地的的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欧洲学术界研究最用力争辩最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吐火罗文的发现，也引起不小的波动。以前所熟知的几个语族的文法和音韵差不多都研究清楚了，真可以说是大势已定；现在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语族，在文法和音韵方面都有很奇怪的特点，学者们又要从新的观点来修正或补充以前研究所得的结果。时间虽然不长，成绩已经很有可观了。

吐火罗文对世界学术的意义，我们只举以上两点。其他在新疆新发现的语言也各有各的重要，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现在我们谈一谈这些语言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自从佛教输入中国以后，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这影响还不见衰竭；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的输入，真是一件大事。但是关于输入的过程，我们一向不十分清楚。倘若

我们问一个比较受过教育的人：佛教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什么地方？大藏经是从什么文字译出来的？他们恐怕都会说，佛教是从印度传来，大藏经当然是从梵文译出来的。然而自从新疆这些语言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在初期，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来的，而是经过新疆各小国的媒介。初期佛经也多半是从这些语言译出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历史上这一件大事的真相才有清楚的观点；大藏经里面许多以前不容易明白的地方，现在也都可以渐渐弄明白了。

在以前，新疆这地方，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几乎是一个空白。虽然每一个朝代的史书里都有记载，但这些记载有的太模糊，有的太简略，有的又太不正确，所以我们对新疆知道的真是太少了。自从新疆这些文献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新疆不但是一个空白，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沟通的所在。东方文化从这里传到西方去，西方文化从这里进入东方。譬如说希腊的雕塑艺术到了健驮罗国混合了别的成分成了一种新风格，再从健驮罗经过新疆传到中国，在中国佛像的雕塑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其间经过的过程，我们在新疆新发现的佛像同壁画上，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追踪出来。再进一步，我们现在再来读《史记》、《汉书》和其他史书关于西域的记载，也可以得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因为人名我们多半可以找出它的原文，地名我们可以确定它的方位，不像以前那样模糊了。

以上说的新疆的新发现对世界和中国学术的意义，只是随便举出了几点，要详细说起来，可以写几本书。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新疆这些新发现的语文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其实是方在开始：有的语言才读通了一半，有的还没有读通，有的连字母我们还不认识。在柏林、巴黎、列宁格勒、伦敦的博物院里，还有很多很多掘出的手稿，待人研究整理。在新疆的废墟里，谁又敢说还有多少东西待发掘呢？

所以，这一门学问，真如朝日初升，前途正未可限量。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现在欧美许多新进学者都到这块园地里来工作，无论是语文学家、历史家、考古家、艺术家，都可以找到适合的研究题目。德国的 E. Schroeder 教授，自己是德国语文学的权威，有一次就曾说过：可惜他年纪老了，不然，他一定研究东方语文学；因为在别的语文学的范围内，旧材料已经研究清楚，顶多不过在小地方有点小发现，新材料又没有，所以研究起来毫无生气。将来的天下是属于东方语文学的。他所说的东方语文学，着重在新疆发现的语文。

然而，回头看看我们中国，情况却完全两样。清末的时候，曾一度盛行过元史和西北史地的研究，后来渐渐消沉下去。新疆这些新材料发现以后，除了间或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翻译的外国学者的论文以外，没听说有谁去认真从事这种研究。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当然有极大的价值，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对这些介绍人都应该有很大的尊敬。然而这究竟是跟着别人走。我们不应该自安于追踪别人，我们也要去研究，让外国学者也跟我们走。

再进一步，在东方语文学，尤其是新疆新发现的语文的研究上，我们中国学者实在应该比欧美学者尽更大的努力。因为第一这些材料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第二这些语文对中国文化史的关

系太深了。我并不主张学术有国家性；不过因为研究方便的关系，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学科的研究上可以超出别的国家。在这里，我们都希望中国在东方语文的研究上可以领导别的国家。然而，事实正大相反，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中国不但不能领导，而且只是跟在后面，有时候，连跟都跟不上，甚至有时候连跟都不想跟。欧洲的许多东方语文学者有时候需要中国古籍的帮忙（这样的时代还真不少）。但欧洲的汉学家数目太少了，他们感觉到非常不方便。在失望之余，便常常用祈求的声调请日本学者帮他们的忙。他们为什么没想到中国学者呢？这原因很简单，无论谁一想都会明白。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大辱。我们都要起来，把这耻辱洗掉！